

《史记》情节的虚构性和传奇性

何旭光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章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说明《史记》既是伟大的著作，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历史、文学高度完整的统一体。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又告诉我们：“艺术作品有三个要素：语言，主题，情节”。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它的语言、主题问题，谈论的人较多，但系统地专门地谈论它的情节问题几乎没有，故笔者仅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文学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性作品和剧本中人物活动的过程，某种性格、典型成长的历史，它是由一系列能显示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具体事件组成的，正如高尔基在《和青年作家谈话》中所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不同作家的作品，其情节是不相同的。因而司马迁的《史记》的情节亦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这里仅谈一下《史记》情节的两个显著特点——虚构性和传奇性。

一、《史记》情节的虚构性

《史记》是历史的文学，这是大家公认的。因而它的故事情节虽然大部份是“实录”，但也有不少地方进行过艺术加工，从

而使得它的某些情节具有虚构性。如《史记》中的“赵武故事”是从《左传》脱胎来的，但《左传》里并没有公孙杵臼和程婴两人救赵、立孤之事。《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是：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史记·赵世家》的描述不仅有了很大的改变，把一百来字的记载加工成一千余字的故事，而且主题精神也与《左传》的记载不相符合。它把统治阶级家族内因乱伦而酿成的相互残杀的事件，改变为复仇的故事：权臣屠岸贾诬陷赵盾为贼首，要杀赵氏家族。赵朔妻有孕在身暂匿于宫中。朔的宾客公孙杵臼与朔友人程婴设法把赵朔妻生下的儿子从宫中秘密带了出来，商议之后，由程婴将朔子藏于山中，又由程婴出面伪告公孙杵臼，说他私藏赵朔之子，于是屠岸贾派兵将公孙氏和假的遗孤杀死。程婴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十五年抚养赵氏遗孤赵武。直到晋景公生病之后，韩厥才告以实情，立赵氏孤儿。于是，赵武、程婴率兵攻打屠岸贾，灭其族。从原来的由于道德沦丧而酿成家族内部互相残杀的故事，到正直忠诚之士为保存赵氏遗孤，在权奸淫威面前不屈服，志在报仇的故事，其间的差异和变化是多么的巨大，从

中可以想象司马迁所作的艺术加工和创造。

关于这个故事，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谬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过也。”这里所说的“无稽”、“荒谬”，实际上就是《史记》情节上的虚构。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又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也。”这里所说的“荒诞”亦是《史记》情节上的虚构。在这里，赵、梁二氏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辨真伪和批评的，却不知司马迁是从或然律和必然出发，虚构了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以歌颂见义勇为，视死如归，敢于反抗强暴的英勇人物。这里，司马迁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普遍的民间心理。赵武故事所表达出来的受压迫者的复仇观念，与《刺客列传》的宗旨是一致的，符合封建时代有仇必报，有冤必伸的社会风尚，是艺术的真实。公孙杵臼、程婴、屠岸贾是否实有其人，无从稽考，但他们之间的斗争故事，却是符合历史的社会本质的。

有时，为了深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造成一种悲壮气氛，在不改变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司马迁还虚构了一些情节。例如《刺客列传》描写聂荣之死就是这样。据《战国策·韩策二》记载：聂荣赴韩市认聂政之尸，并无市人劝她不要相认的情节，而且她最后的死，也不是“于邑悲哀而死”，而是“自杀”。因此，司马迁的下面描述，其情就带有很大的虚构成分了：

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赏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

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这段对话，声泪相应，凄怆悲壮，把聂政借躯为知己报仇，至死不愿连累同胞手足的情肠，把聂荣不怕殁身之诛，以扬贤弟之名的的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夺人心魄！这样的细节虚构，并没有妨害作者笔下的人物保持其历史上的真实面貌，同时又突出地表现了人物某种理想主义精神境界。

《史记》情节具有虚构性的例子很多，真是不胜枚举。《高祖本纪》描写刘邦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的情节；含有人们对这位汉王朝创始人的敬畏心理，更有封建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给自己的祖先加上的迷离吓人的光圈，借以愚弄、恐吓劳动人民。这一情节显然具有虚构性。至于《李斯列传》描写赵高欲自立而不得的情节则是真假各半：“（高）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应为孙），授之玺。”“左右百官莫从”是写实，“殿欲坏者三”则明显属于虚构了。

由此观之，《史记》情节具有虚构性。正因为如此，才使它具有文学性，具有艺术魅力，才使得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鲜明生动。

二、《史记》情节的传奇性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情节，不仅具有虚构性，还具有传奇性。所谓“传奇”就是“传示奇异”（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史记》情节的传奇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史记》记载了不少的古代神话传说。《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生而灵异，弱而能言”；《殷本纪》写简狄吞玄鸟卵，“因孕生契”；《周本纪》写姜原践巨人迹而生弃；《秦本纪》写女脩吞玄鸟卵而生大业；《大宛列传》载“乌孙王号昆莫……生弃于野。鸟啖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这些都是有关氏族或国家起源的典型神话。《秦本纪》载有“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周本纪》载有二神龙螭化玄黿，后宫童妾遭之而生褒姒等，都是有名的传说。远古的历史，除了依据神话材料，是很难写的。所以，历史家们常常以神话为史。司马迁也相信《五帝德》，《帝系姓》所传的神话，认为“其所表见皆不虚”，故“择其言尤雅者”记之（《五帝本纪》）。

其次，《史记》记载了不少的灾异祲祥。《秦本纪》载：“（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涪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吕后本纪》载：“（七年）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轘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高后遂病掖伤。”《孝文本纪》载：“十五年黄龙现成纪，天分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欲出周鼎，常有玉英见。”类似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又次，《史记》记载了不少的征梦、验卜的故事。如《外戚世家》载：“薄姬夜梦苍龙据其腹”，后来便生下了孝文帝；窦广国自卜“数日当为侯”，“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都是一

一应验了的。与此相似的，还有所谓“相人”的故事。《高祖本纪》载：“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黥布列传》载：有客相黥布“当刑而王”；《卫将军骠骑列传》载：一钳徒相卫青“官至封侯”；《佞幸列传》载：善相者相邓通“当贫饿死”；如此等等，也都一一得到了验证。

又次，《史记》记载了大量的奇人奇事。司马迁所描写的某些理想人物，虽是历史真有其人，但他们的某些事迹，某些情节，却有不少来源于传说。司马迁就常常借用这些传说，来增强故事情节的传奇色彩，表现人物的特异性格。例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亡匿下邳，就穿插了一段“圯上遇老父”的神奇传说。这位老父也怪，偏偏看上了这个“孺子”，故意把自己的鞋子丢到桥下，要张良去取来给他穿上。接着又约张良相会，两次都因张良后到而怒斥他，到第三次——

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这样的奇事，显然出于民间传说，司马迁用它，主要是为了表现张良那善于忍耐的性格。同时，它又使作者笔下这位“王者师”的形象，具有了神奇的色彩。

《史记》记载这类奇人奇事的地方很多。如刘邦的无赖行为，韩信受胯下之辱，黥布受刑封王，李广射石虎，等等。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有着异常的行为，如刘邦溲溺儒冠中，身为郎中令，满头白发的石建亲自为其父亲洗涤褻衣和便器，张汤为其属吏鲁谒居摩足，邓通为文帝吮痂等。这些奇人奇事

奇行，即使是历史事实，却具有传奇色彩。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史记》的情节具有传奇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正因为这样，它的文学性才特别强，才具有小说的某些因素。这一点，对汉末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对唐宋传奇文，对明清传奇剧，对宋元以来的传奇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风格——“传奇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许多中国戏剧小说的评论者都明确的指出了这些作品与《史记》在风格传统上一脉相承的关系。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序》中直接拿《水浒》与《史记》对比，指出“传中警策，往往似之”，“即谓此书乃牛马走之下走，亦奚不可！”清代佚名在《儒林外史·回评》中说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传奇虽小道……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曹雪芹自称《红楼梦》为传奇作品，而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则赞扬他“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这些说法都明确肯定了这一点。

三、形成《史记》情节的虚构性

和传奇性的原因

从《史记》材料的来源看，绝大部分是真人真事的“实录”，但也有人们虚构的因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予……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之理，凡百三十篇。”在这两篇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中，司马迁本人都提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问题。而“放失”了的“天下旧闻”里面既

有历史事实，也有天下人们长时间凭想象创造出来的故事。把这些材料写进《史记》中，这就决定了《史记》既包含着真人真事的“实录”，又有人们虚构的因素，因而使得《史记》的情节具有虚构性和传奇性。

从司马迁对他所掌握的材料进行“考信”的标准看，《史记》不纯是“实录”，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真人真事的限制。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史记》是“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即所谓“考信于六艺（经）”。他掌握的材料，符合六艺（经）的就写进《史记》，否则就扬弃了。而儒家六艺（经）的真实性却很值得怀疑？实际上，六艺（经）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综合文献。《易经》是一部哲学著作，已经失传的《乐经》当有不少的文学因素，《诗经》则是纯文学作品，就是多记文告的《尚书》，多记典章制度、官职名称的《周礼》，所记的也不完全是史实，完全可以当作历史读的，只有孔子的《春秋》，而《春秋》大量的传文则要另当别论。司马迁笃信六艺（经），并以六艺（经）作为判断材料真伪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史记》不纯是“实录”。大禹是历史上治水的英雄，但《史记·禹本纪》的记载却不无夸大之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确实产生了真假难辨的问题；而从文学角度看，司马迁把这些虚构的充满了文学因素的故事记载下来，纳入某某人的传记之中，就突破了真人真事的限制，从而使得《史记》的情节具有虚构和传奇色彩。

从司马迁“爱奇”的倾向看，《史记》的情节具有传奇性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司马迁有“爱奇”的一面，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应劭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引》所引），刘勰说他“爱奇反经”

《文心雕龙·史传》），司马贞说他“其人好奇词省”（《史记索引后序》），赵匡说他“好奇多谬”（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议》，杨伯峻先生说他“好奇之过”。可见，在司马迁的思想和创作中，确有“爱奇”的倾向。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人物传记时，不仅运用了冷静的、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饱含感情，还运用了形象思维，致使它的情节具有虚构性和传奇性。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文字，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写《史记》的人物传记时，

不仅运用了冷静的、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思考、品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且饱含感情，经常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艺术构思，运用细节描写，运用想象、夸张以至虚构等艺术手段。正因为如此，《史记》的许多人物传记才产生了“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坤语，转引自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艺术效果，因而使得《史记》的某些人物传记的某些情节具有虚构性和传奇性。

文海拾零

《采薇》诗末章并未用反衬手法

张庭烈

《诗·小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此章写得情景交融，历来为论者所乐道。清代王夫之曾谈到此章诗，认为是“为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即我们现在所谓“反衬手法”。现代学者周振甫也曾在他的《诗词例话》中把此章作为反衬的例证之一。但我认为，此章诗并不是用了反衬手法。

显而易见，《采薇》诗中的戍卒并不是“急于回家而不顾雨雪忙着赶路”（见《诗词例话》），而是相反，“行道迟迟”，心情并不是“愉快

的”，加倍显出心情的愉快，而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细品之下，难以找到写“乐”的蛛丝马迹。清代方玉润说：“末乃言归途景物，并回忆来时风光，不禁黯然神伤”（《诗经原始》）与诗意正合。戍卒反乡本是乐事，那么《采薇》末章为何表现出心情沉重呢？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见余冠英《诗经选注》与陈子展《诗经直解》），但无论如何，万变不离其哀，诗中决没有“以哀景写乐，以乐景写哀”的反衬手法，而是通过自然风物的变迁与戍卒归途的辛苦，直接表现了戍卒悲凉沉重的心情。